

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的建树和晚年概况

姜光斗 顾 启

正当韦应物位于朝官逐渐消沉下去的时候,又在贞元四年(788)秋,被任命为苏州刺史,让他去治理比江州更加富庶的“大藩”。关于苏州的富庶繁华和版图之大,比韦应物稍后的白居易曾有具体的描写:

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①

阖闾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闾阎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②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大都市。韦应物有感于此,颇想干一番事业:

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俗繁节又喧,雨顺物亦康。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于兹省屯俗,一用劝农桑。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③

尽管诗的结尾稍有点泄气,但全诗洋溢着一种喜悦之情和积极奋发的精神,诗人感到让他到这个大郡来,“省屯俗”,“劝农桑”,是可以干出一点有利于人民的事业的。

刺苏前期,韦应物十分关心民瘼,他曾训诫下属,必须“矜老疾,活艰困”,凡贫民拖欠的赋税,命令“乡计之而白于县,县审之而上于郡”,然后由刺史根据实情予以蠲免^④。他的这种行为,曾受到史家的赞扬:“若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亦可谓循吏,而世独知其能诗耳。韦公以清德为唐人所重,天下号曰韦苏州,当贞元时为郡于此,人赖以安。”^⑤因此,即使在酣歌宴饮中,他也没有忘掉民生的疾苦:

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烦疴近消散,嘉宾复满堂。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

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⑥

白居易称赞此诗“最为警策”^⑦,杨慎称赞它“为一代绝唱”^⑧。除了着眼于它的艺术手法外,主要是赞扬他民胞物与的伟大胸襟。“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推己及人,居安思困,一饭不忘来处,这是他关心民瘼、搞好政务的动力。

这时韦应物从政的热情很高,在岁末冬宴时看到“戎士气益振”的场面,他感到很高兴,勉励部下要以积极工作的态度来报答“皇恩”:“顾谓军中士,仰答何由申?”^⑨他自己也是勤奋地处理政务,“大藩本多事,日与文章疏”^⑩,连诗歌创作都暂时搁下了。辛勤耕耘,总会有收获的。韦应物努力从政的结果,换来了州民小康的局面,他也享受到了这种愉快:“宴集观农暇,笙歌听讼馀。”^⑪

然而好景不长,麻烦的事愈来愈多,韦应物积聚在心头的的不愉快也愈来愈浓重:“居藩久不乐”^⑫,表面的原因似乎仅仅是:“谬忝诚所愧”^⑬,自己因搞不好政务而感到惭愧,

实际上却别有更深的原由在。首先，朝廷派来的巡郡大使会百般挑剔，有意找岔子，“政拙劳详省，淹留未得归”^⑭，他们久久地赖在苏州不走，显然别有用意，而韦应物是不愿意阿迎的，这自然增加了他心头的不快。其次，他部下的里胥为了催索贫苦人民拖欠的赋税，叫骂威胁，鞭笞禁锢，无所不为；这是违背他的初衷的。们身为刺史，当然都把帐算在他头上，这自然又增加了他的不快。再次，州刺史本有察举人才的权利，可是他却因州有贤才而无权举荐感到痛苦：“邑中有其人，憔悴即我愆。由来牧守重，英俊得荐延。匪人等鸿毛，斯道何由宣！”^⑮基于以上这些原因，他又变得消沉起来：

素寡名利心，自非周圆器。徒以岁月资，屡蒙藩条寄……常负交亲责，且为一官累。况本蓬落人，归无置锥地。省己已知非，枉书见深致。虽欲效区区，何由枉其志。^⑯

他归隐故乡的心情又日见迫切。于是，故态复萌，他又去逍遥山水、锄药赏竹、饮酒养真、参禅悟道了：

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虑，公门自常事，道心宁易处？^⑰
似与尘境绝，萧条斋舍秋。寒花独经雨，山禽时到州。清觴养真气，玉书示道流。岂将符守恋，幸以栖心幽。^⑱

过去人们认为韦应物的这一类诗，冲淡闲雅，脱尽人间烟火。联系韦应物的生平和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这类诗实际上是在官场碰壁以后一种反常的、消极的表现。如果都像他现在那样当官，里胥会更加横行霸道，人民会更加遭受蹂躏。而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好比有人一面嘴里嚼着猪肉，一面口中又在念着“君子远庖厨”一样的可笑。

韦应物在刺苏期间，跟当时著名诗人刘太真、顾况、孟郊、秦系、皎然、丘丹等颇有交往，共同对诗歌创作问题进行探讨，相互发生较大的影响，现分述于下。

刘太真，宣州人，拜著名古文家萧颖士为师，萧对他十分赞赏，曾称之为“太真，吾入室者也”^⑲。贞元四年（788）重阳节，他曾和唐德宗《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被评为上等，由此可见其诗名之著。刘太真本有集三十卷，可惜都散失了，今仅存诗三首，其中有一首题为：《顾十二况在迁，过韦苏州、房杭州、韦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诗，辞章高丽，鄙夫之所仰慕，顾生既至，留连笑语，因亦成篇，以继三君子之风焉》。仅据诗题，就可看出刘太真对韦应物、顾况等诗歌的仰慕钦佩之情。刘太真另有《与韦书》云：

顾著作来（原注：况也），以足下《郡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畅茂遒逸如此！宋、齐间沈、谢、吴、何，始精于理意，然缘情体物，备诗人之旨，后之传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横流，师挚之始，《关雎》之乱，于足下之文见之矣。^⑳

认为韦应物的诗歌，能缘情体物，上继《诗经》的优良传统，写得既有情致，又有骨力。这种恰如其分的赞许，对韦应物写作富有现实意义的诗篇，显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顾况，字逋翁，苏州海盐（今属浙江）人。既工诗，又善于书画，皎然曾写诗赞扬他：“吴门顾子予早闻，风貌真古谁似君？人中黄宪与颜子，物表孤高将云片。性背时人高且逸，平生好古无俦匹。醉书在箧称绝伦，神画开厨怕飞出。谢氏擅郎亦可俦，道情还似我家流。”^㉑由此可见，顾况的性格和志趣跟韦应物极相融洽。而顾、韦处于李白、杜甫之后，元白、韩孟之前，在两个诗歌高峰的中间，都是力主创新的。顾况以狂放诡奇的面貌矫俗，韦应物以简净古淡的风貌矫俗，二人殊途而同归。所以顾对韦的诗作也极其佩服，曾和其《郡斋燕集》诗，倾诉了对韦的深厚感情：“白云帝乡远，沧江枫叶鸣。却略欲一言，零泪

和酒倾。寸心欠摧残，别离重骨惊。”^②顾况诗集中关心民瘼之作甚多，如《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著名的《困》即为其中第十一章）《弃妇词》等，跟韦集中这类诗作的精神是一致的。两人在诗歌创作上相互切磋，显然有利于提高各自的创作水平。

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比韦应物小十四岁，为韩派重要诗人，一生困顿，诗歌多反映寒士和人民的寒苦之音，诗风瘦硬。他曾有诗赞扬韦应物的诗风：

谢客吟一声，霜落群听清。文含元气柔，鼓动万物轻。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尘埃徐庾词，金玉曹刘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鲜明。萍苹一浪草，蘼蒲片池荣。曾是康乐咏，如今事其英。顾惟菲薄质，亦愿将此并。^③

说韦应物象嘉木一样生性正直，没有曲枝。将他的作品比喻成如同谢灵运的作品，饱含元气，廓清群听，诗风雅正，使山川自然之美表现得更加鲜明。说他的名声象曹植、刘琨一样响亮，而把徐陵、庾信之作看得象尘土。这样的说法难免有溢美之辞，但我们认为韦应物描写自然之美的作品确实是继承了谢灵运的某些艺术技巧，因而指出这一点还是很有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孟郊对这位前辈诗人如此倾倒，证明孟诗也是受到韦诗一定影响的。

秦系，字公绪，会稽人，隐于泉州南安九日山中，注《老子》，整年不出。权德舆曾有文叙其为人和诗歌的成就说：“儒有秦公绪者……于当时遭多故，道进身退。越部山水，佐其清机，圆冠野服，僛然自放。……随州刘君长卿……尝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词或约而旨深，类乍近而致远，若珩珮之清越相激，类组绣之玄黄相发，奇采逸响，争为前驱……”^④《全唐诗》中共收录秦系诗四十首，其中五言诗仅十八首。可见已佚失很多。现存秦系诗几乎全部是写山林闲适隐逸生活的，这很投合韦应物一定时期的思想情趣、因而对他非常钦佩。秦系被征为秘书省校书郎时曾写了一诗呈韦应物：

久卧云间已息机，青袍忽著狎鸥飞。诗兴到来无一事，郡中今有谢玄晖。^⑤

韦应物读到这首诗以后，曾有答诗云：

知掩山扉三十秋，鱼须翠碧弃床头。莫道谢公方在郡，五言今日为君休。^⑥

韦、秦二人这两首诗，至少能说明以下两个问题：其一，秦系将韦应物比为谢朓，不仅是对他的恭维，主要是看出韦诗继承了小谢五言诗的优良传统，这为我们研究韦诗的渊源，作了很好的指示；其二，韦应物对秦系五言诗艺术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韦应物那些闲适诗，曾受秦系作品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皎然，字清昼，吴兴人，是谢灵运十世孙。他曾参加由颜真卿主持的《韵海敬源》编写工作，由此取得很高的名声。他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全唐诗》称其“文章隽丽”^⑦，共收诗七卷。他的诗歌理论著作《诗式》与《诗评》，在文学批评史上有较重要的地位。据史书记载，皎然曾在诗歌的创作和理论上深得韦应物的帮助：

（皎然）尝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求合韦苏州，韦大不喜。明日，献其旧制，乃极称赏云：“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得至。”昼大服其鉴裁之精。^⑧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韦应物主张写诗应当根据各人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创造，而反对因袭模仿；他还主张突破诗律，不拘常格：“今体诗中偏出格”^⑨。这些主张对皎然都曾产生过较深刻的影响。皎然对韦应物的诗歌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诗教殆沦缺，庸音互相倾。忽观风骚韵，会我夙昔情。荡漾学海资，都为诗人英。格将寒松高，

气与秋江清。何必邺中作，可为千载程！受辞分符竹，万里临江城。到日扫烦政，况今休 黜兵……^②

赞扬韦应物能排庸音，追风骚，格高气清，可为千载榜样。我们认为，这些议论并不是盲目的捧场，而是深得韦诗真髓和深知当时诗弊的知音之论。在平庸纤弱的大历诗风笼罩下，韦应物锐意革新，以其高古淡雅的诗风力挽狂澜，确实起到了起衰纠偏的作用。而皎然的评价则是当时人对韦诗艺术的一个精当的总结。

丘丹，嘉兴人，曾担任过诸暨令、尚书郎等官职，后隐居于临平山。韦应物与他 交谊深厚，唱和之作甚多。韦集中共有六首寄赠送别之作，其中《赠丘员外》有句云：“高词弃浮靡，贞行表乡闾”，可见韦对其诗风和为人的钦佩。《全唐诗》卷三〇七共收丘诗十一首，倒有五首是跟韦应物唱和的，其中《和韦使君听江笛送陈侍御》云：“离尊闻夜笛，寥亮入寒城。月落车马散，凄恻主人情。”亦写得情景交融，清新可诵。

根据当时制度，“刺史县令自今后改转，刺史以三年为限，县令四年为限”^③。除了特殊情况，一般都是照此执行的。韦应物于贞元四年（788）秋刺苏，到贞元七年（791）秋被免职，恰为三年。因从现存于韦集中的几首反映他免职后生活情况的诗歌来看，节令显然是岁末暮冬或岁初早春，即贞元七年暮或八年初春，韦应物已闲居于苏州郊居之永定寺，那么，将他的免职时间推定为贞元七年秋，大致是不错的。

如前所述，到了刺苏后期，韦应物日益消沉，结交了不少隐者和僧道，过着焚香独坐的清闲生活，甚至于想服药以求长生。他的《饵黄精》诗写道：

灵药出西山，服食采其根。九蒸换几骨，经著上世言。候火起中夜，馨香满南轩。斋居感众灵，药术启妙门。自怀物外心，岂与俗士论。终期脱印绶，永与天壤存。

黄精是一种滋补中药，有补气、润肺、生津的功效，服食黄精当然跟服食汞丹不同，不能看作是迷信的行为。但从这首诗的最后四句来看，却也不能否认韦应物有一定的成仙思想。从“自怀物外心”、“永与天壤存”的期待中，更不难看出宗教对韦应物的消极思想影响。罢职之初，他似乎感到很潇洒自在，曾有《野居》诗言志：

结发屡辞秩，立身本疏慢。今得罢守归，幸无世欲患。栖止且偏僻，嬉游无早晏。遂免上坡冈，捕鱼缘赤涧。高歌意气在，贳酒贫居惯。时启北窗扉，岂将文墨间。

过着捕鱼打猎、宴饮嬉游、高歌赋诗的清闲生活，实现了他的夙愿，似乎应当心满意足了，可是实际上空虚寂寞之感还不时涌上心头：

子有新岁庆，独此苦寒归。夜扣竹林寺，山行雪满衣。深炉正燃火，空斋共掩扉。还将一尊对，无言百事违。^④

从“无言百事违”这个结句中可以看到韦应物充满着痛苦的心声：“兼济天下”的大志并未能很好地实现，在历任地方官任上，尽管诗人作了不少努力，但由于社会制度的种种限制，韦应物并未能真正地解民于倒悬之苦，只好空叹“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诗人做了近三十年的官，到头来还是两袖清风，甚至连返回故乡的路费都没有：“政拙忻罢守，闲居初理生。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⑤只能在梦中享受一下回乡之乐。不仅如此，甚至连生活都没有着落，只好寄迹野寺，租田督子弟耕种：“野寺霜露月，农兴羁旅情。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⑥再加上老境渐至，衰象毕露：“眼暗文字废，身闲道心情。即与人群远，岂谓是非婴？”^⑦尽管表面上很旷达，却掩不住骨子里的凄凉！

“眼暗文字废”的自述是相当真实的，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韦应物的诗作了。大约在

元九年(793),这位富有独创性的杰出诗人,终于与世长辞了。(编者按:此文系《韦应物评传》之一章,本刊略有删节。)

注:

① 白居易《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尹诸客》。② 白居易《登阊门闲望》。③ 《登重玄寺阁》。④ 李观《代李图南上苏州韦使君论戴察书》,载《李元宾文集》。⑤ 宋朱长文《首趾图谿续变》卷上“牧守”门。⑥ 《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⑦ 白居易《吴郡诗石记》。⑧ 杨慎《升庵全集》卷五四“考应物苏州郡斋燕集诗”条。⑨ 《军中冬燕》。⑩《赠丘员外》。⑪《酬阎员外陟》。⑫⑬《送陆侍御还越》。⑭《赠李判官》。⑮《酬张协律》。⑯《答故人见谕》。⑰《晓坐西斋》。⑱《郡中西斋》。⑲见《唐诗纪事》卷二十八“刘夫真”条。⑳见《唐诗纪事》卷二十六“韦应物”条。㉑见《皎然集·送顾处士》。㉒见赵昌平校编《顾况诗集》二五页《酬本部考左司(时况在迁饶州)》。㉓孟郊《赠苏州韦郎中使君》,载《全唐诗》卷三七七。㉔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载《文苑英华》卷七一六。㉕秦系《即事奉呈郎中韦使君》。题下原注:“时系试秘书省校书郎。”㉖《答秦十四校书》。㉗《全唐诗》卷八一五“皎然小传”。㉘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三。㉙《寄答秘书王丞》。㉚皎然《答苏州考应物郎中》。㉛见《旧唐书·代宗纪》广德元年七月记载。㉜《永定寺喜辟强夜至》。㉝③④⑤《寓居永定精舍》。

(上接第35页)

并把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专门的业务学习结合起来。因此青年教师进步都很快,到一九五三年先后开课的助教就达到二十三人,解决了当时教学任务多而教师不足的严重困难。

天石同志非常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注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敢于任用一些具有真才实学但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展其所长的知识分子来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

天石同志对干部知人善任。在使用上既大胆放手,又严格要求,并引导干部在实践中锻炼思想,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他特别注意培养干部从外行变为内行,要求政工干部至少要钻研并掌握好一门课程,能上讲台教课。当时政治辅导处的处、科级干部差不多都去兼上公共政治课,其余同志则跟班听课和参加辅导工作,并要求他们作出在一定时间内达到开课水平的计划。

优良作风 民主办校

天石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建院初,他立即组织成立院务委员会,学校的重大工作均向院务委员会报告和交付讨论决定。院委会成员有广泛的代表性,除各处、各系科班的负责人外,还有一般教师和学生的代表。他在任的三个学期共召开了十四次院委会,开会时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深入展开讨论;学校经费收支也向大家公开,充分表现了他民主办校的精神,他平时密切联系群众,热情关心同志,经常深入到基层,虚心听取和采纳意见。他为了便于经常接触教师和指导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主动把自己编在马列主义教研组教师的政治学习小组里。作为一院之长而同教师在一个小组里共同学习,这是少见的。他对群众来信来访十分重视,总是及时而认真地答复、解决。他不仅关心教师和干部,就是伙食房、印刷厂、操场、学生宿舍等处,他也经常下去,很随和地跟职员、工人和同学们接触谈心。因此大家心情舒畅,积极性很高,全校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热气腾腾、紧张团结、秩序井然的新局面。这样,天石同志就在全校师生员工中自然地树立了很高的领导威信。直到今天,我校当年在他领导下的许多师生员工仍然深深地怀念他。